



2 016 6929 3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张国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  
中国经济史研究丛书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张国辉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 **洋务运动与中国近代企业**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太阳宫印刷厂印刷**

---

**850×1168毫米 32开本 13.5 印张 342千字**

**1979年12月第1版 1984年9月第2次印刷**

**印数8,001—16,000册**

**统一书号：4190·009 定价：1.60元**

## 前　　言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出现的所谓洋务运动扰攘了三十多年。在这期间，中国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这次运动乃是清王朝封建政府投降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并和他们相结合的产物。洋务派是以所谓“自强”相号召的。但是，洋务运动发展的过程，本质上既是清政府拍卖民族权益，换取国际侵略势力的支持，以巩固封建统治的过程；同时又是国际侵略势力驯化清封建统治集团，从而向中国政治、经济、军事领域渗透侵略势力的过程。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第二次鸦片战争到九十年代甲午战争，国内外反动势力的这种勾结过程，正是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形成和中国人民不断反抗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过程。在经济上，当时阶级斗争的形势规定了清统治集团寻找侵略势力的支持，他们首先从摭拾西方生产技术，创办近代军用工业开始。

近代军用工业的兴办，不可避免地要求兴建一系列与之相适应的近代民用企业。而第一次鸦片战争以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的入侵，对中国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基础产生了破坏作用，为资本主义准备了商品市场和劳动力市场，为民用企业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出现提供了客观条件。七十年代初，某些官僚、地主和商人就是在这种条件下，开始投资于资本主义近代企业的。

洋务派官僚默察形势，便利用和控制了这种兴办近代企业的潮流，力图把它纳入为巩固封建统治的轨道。为此，他们提出一个“求富”的口号，并以“官督商办”的组织形式作为主要的形式来控制私人资本。这就使得“官督商办”的资本主义新式企业为中国阶级关系的变化带来不少不同于一般资本主义所产生的特点。本

书准备就洋务运动的发展过程，剖析洋务派所经营的军用、民用企业的实质，探讨中国资本主义发生过程中阶级关系的某些特点。

限于水平，本书难免有缺点和错误，希望读者给予批评、指正。

一九七九年一月

# 目 录

## 前 言

<b>第一章 鸦片战争后清政权的买办化和所谓洋务运动的 发生</b> .....	(1)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清政权的买办化.....	(1)
第二节 维持反动统治的所谓洋务运动.....	(13)
<b>第二章 所谓“自强”政策与清政府的近代军用工业及新式 海军的建立</b> .....	(21)
第一节 近代军用工业的建立过程及若干典型企业概 况.....	(22)
一、江南制造总局 .....	(26)
二、金陵制造局 .....	(35)
三、福州船政局 .....	(39)
四、天津机器局 .....	(54)
五、兰州制造局 .....	(61)
六、山东机器局 .....	(62)
第二节 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及其反动的历史作用 .....	(69)
一、近代军用工业的性质 .....	(69)
二、近代军用工业的反动历史作用 .....	(76)
第三节 西方船炮的采购和清政府的“海防”政策.....	(85)
一、早期购买船炮和“阿思本事件”所暴露的矛盾.....	(85)
二、清政府的“海防政策”与英、德势力控制中国海军的 争夺 .....	(92)
三、清政府海军的建立 .....	(106)

<b>第三章 所谓“求富”政策和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上)</b>	.....	(117)
<b>第一节 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产生的历史条件和经营形式</b>	.....	(117)
一、民用企业的产生条件	.....	(117)
二、民用企业的经营形式简述	.....	(125)
<b>第二节 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酝酿和轮船招商局的产生</b>	.....	(127)
一、中国近代航运业的酝酿	.....	(127)
二、轮船招商局的产生	.....	(145)
三、轮船招商局在发展过程中所反映的各种矛盾	.....	(152)
四、轮船招商局的经营状况和资本积累	.....	(167)
<b>第三节 中国近代煤矿和金属矿业的产生和发展</b>	.....	(181)
一、中国近代煤矿工业的产生背景	.....	(181)
二、中国近代煤矿的产生	.....	(184)
1. 台湾基隆煤矿的创建和衰落	.....	(188)
2. 磁州、兴国煤铁矿的失败和开平煤矿的创建	.....	(199)
3. 其他中小型煤矿情况简述	.....	(211)
三、中国近代金属矿开采简况	.....	(217)
1. 山东平度金矿的筹建	.....	(222)
2. 黑龙江漠河金矿的开发	.....	(225)
<b>第四章 所谓“求富”政策和洋务派经营的民用企业(下)</b>	.....	(230)
<b>第一节 中国电报和铁路的产生及沿海外商海底电线的敷设</b>	.....	(230)
一、中国电报的产生和发展	.....	(231)
二、沿海外商海底电线的敷设	.....	(249)
三、中国铁路的产生	.....	(260)
<b>第二节 中国近代棉纺织业的产生</b>	.....	(268)

一、中国近代棉纺织业产生的历史条件简述	(268)
二、几家棉纺织工厂的产生和初步发展	(272)
1. 上海机器织布局	(272)
2. 湖北织布官局	(282)
<b>第五章 官督商办企业的半殖民地性和半封建性</b>	(289)
第一节 官商结合和官督商办企业的发展历程	(289)
第二节 官督商办企业与资本帝国主义势力的联系 和矛盾	(303)
第三节 官督商办企业中的官商矛盾与官僚资本主义 的发生	(321)
<b>第六章 官督商办企业与中国近代社会阶级关系的新变 化</b>	(339)
第一节 中国资产阶级的发生	(339)
一、洋务官僚	(346)
二、买办商人	(353)
三、旧式商人的上层	(367)
第二节 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发展	(371)
一、中国产业无产阶级的若干特点	(372)
1. 与农民存在着天然联系	(372)
2. 高度的集中性	(374)
3. 卓越的生产技能	(377)
二、中国产业工人所遭受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	(379)
1. 低下的工资水平	(379)
2. 漫长的劳动时间	(381)
3. 野蛮的封建管理	(382)
三、中国产业工人的反抗斗争	(384)
<b>附录一、统计资料</b>	(388)
表一、江南制造总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67—1894年)	(388)

表二、金陵制造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79—1891年).....	(390)
表三、金陵火药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84—1892年).....	(391)
表四、福州船政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66—1895年).....	(392)
表五、天津机器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67—1892年).....	(393)
表六、山东机器局历年收入支出表(1876—1892年).....	(394)
表七、北洋海军经费收支示例(1889—1890年).....	(396)
表八、轮船招商局历年余款支出统计(1873—1893年) .....	(398)
表九、英国输华货物价值统计(1840—1860年) .....	(403)
表十、国内电线设立简表(1879—1894年) .....	(404)
附录二、参考书目 .....	(408)
一、马克思列宁主义经典著作 .....	(408)
二、中文参考书目 .....	(409)
三、中文报纸期刊 .....	(412)
四、外文参考书目 .....	(412)
五、外文报纸期刊 .....	(415)
附录三、名词对照表 .....	(416)
一、人名类.....	(416)
二、企业名称类 .....	(417)
附录四、中外年号对照表(1840—1895年) .....	(419)

# 第一章

## 鸦片战争后清政权的买办化和 所谓洋务运动的发生

### 第一节 鸦片战争后清政权的买办化

第一次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屈辱的《南京条约》在中国社会各阶级中产生了强烈的反响。地主阶级的政治代表在侵略者又打又拉的过程中扮演了开门揖盗，引狼入室的角色，从而加剧了酝酿已久的国内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伟大的太平天国革命就是在鸦片战争后十年爆发，革命的火把燃遍大半个中国。为了维护封建统治，地主阶级历来坚持“防民甚于防寇”，“患不在外而在内”<sup>①</sup>的反动信条。尤其是当反对封建主义的斗争严重地威胁到这一反动阶级的生存时节，它宁愿屈从国际反动势力的压迫，背叛民族利益，与国际反动势力相结合，主动地走上卖国道路。

反动的清政权和资本帝国主义的合流开始于一八五三年太平天国革命力量进入长江下游前后；到了一八六〇年可耻的《北京条约》签订后，中外反动势力的勾结便更加紧密起来了。这一时期中，剧烈的革命与反革命的内战处在你死我活的决定性阶段，陷于崩溃边缘的清王朝在垂死的挣扎中堕落到不择手段的地步。

以推翻地主阶级腐败统治相号召的太平天国农民大革命从一八五〇年起义，经过两年艰苦的武装斗争，开创了一个飞跃发展的革命局面。从广西出师的太平军，过湖南，顺长江进入湖北，到

<sup>①</sup>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7，第32、34页(以下简称《始末》)。

一八五三年一月，一举攻克武昌。武汉解放，长江下游顿时一片动荡。十分明显，一八五三年对革命和反革命双方都是一个关键性的年头。这一年处在长江下游的清王朝地方势力，在万分惊慌中，竟然把逃脱灭亡的命运寄托在西方侵略势力的“援助”上。江苏巡抚杨文定在二月间急急忙忙指令行商出身的苏松太道吴健彰，要他投奔上海英国领事馆，乞求英国兵船驶入长江，拦击向长江下游扫荡的太平军<sup>①</sup>。到三月初，那个屡吃败仗、尾追太平军而不敢正面交锋的清朝钦差大臣向荣也把截击太平军的力量寄望于停泊在上海的外国火轮船上。他远从九江“飞札”吴健彰，命令他不论用什么方法，“或赁或借，必得设法办理”<sup>②</sup>，务必把火轮船弄到手，以遏制太平军的凌厉攻势。三月中，太平军先锋部队直逼南京城郊，眼见长江以南清王朝的封建统治土崩瓦解，杨文定再次命令吴健彰，于十五日星夜向上海各领事馆转达他的哀求，期望把泊在上海的外国兵船立即开去救急，以便在下关水面拦击太平军，“掩护南京”<sup>③</sup>，挽救江南危局。

发人深思的是，不论杨文定或向荣这时所进行的活动都是背着清政府的中枢私自向外国势力呼救的。然而，这种擅权的非法活动不但不曾受到斥责，反而在事后得到赞许。就在这一时期中，连咸丰皇帝自己也在不到二十天内，三次谕旨，催促杨文定、向荣、吴健彰“设法权宜办理”，速“由上海雇火轮船及师船由海入江”<sup>④</sup>。在这样短促的时间里，发出这样多的允许地方官员与外国势力相接触的“上谕”，这个事实本身充分地说明了封建地主阶级

① 《一八五三年三月三日阿礼国上文翰机密报告》，F.O. 228/161。转引自严中平：《太平天国初期英国的侵华政策》，《新建设》，1952年9月号。

② 向荣：《咸丰三年正月二十六日，接钦差大臣关防折》（九江发），《向忠武公会办发逆奏疏》卷1（抄本）。

③ 《上海道致阿礼国领事照会》，1853年下院兰皮书《有关中国内战文书》，第3—4页，转引自严中平：上引文。

④ 见咸丰三年三月初十日、二十二日、二十七日谕旨，见《向荣奏稿》卷2，转引自中国史学会编：《太平天国资料》第7册，第77、93、94页。

为了挽救统治权，已经顾不得民族的界线了。

对于国际资本帝国主义而言，豢养一个驯服的买办政权乃是扩张侵略势力必不可少的手段。从太平天国革命爆发以来，国际反动势力一直在寻找扩大权益的时机。上海英国领事馆以极大的注意力注视着战局的变化。还在一八五二年一月，英国驻上海领事阿礼国(R. Alcock)曾广泛地就清政权在对外关系的处理上作了回顾，并提出扩大西方侵略权益的计划。他指出“道光对于我们武力的优越性是有屈辱经验的，在他在位期间深愿避免再起冲突，这是大家所公认，也是他自己所承认的”；继承道光的咸丰由于年轻，还没有足够地“接受他父亲的经验教训”，“但在目前由于特殊的困难处境，若再加上〔我们的〕威胁手段，那么，他是会和他的前任在上次战争结束的时候一样地易于就范的”。况且，从当时中国政治形势的变化，即革命的太平军推翻反动清王朝的内战形势来看，阿礼国赤裸裸地主张：“现在这个时候要比以后任何时期都更宜使用威胁手段取得成功”<sup>①</sup>。因此，他曾向当时任香港总督兼使华全权代表文翰(S. G. Bonham)建议，趁此清王朝陷入“特别困窘的地位”作为英国侵略者扩大侵略权利的时机。现在他接到清朝地方当局的乞求，自然更认为是机不可失了。他立即派遣专差，乘坐鸦片走私快船，向文翰送去紧急公文。阿礼国强调“毁灭性的战争〔指太平天国革命〕正在迅速摧毁”清朝政府的“一切基础”，战局的发展表明“〔清朝〕皇帝的地位是绝望的”，清王朝的“最后胜利的唯一希望系于国外列强的有效援助”。阿礼国认为吴健彰代表杨文定的乞援实是英国武装干预的一个“极其难得、稍纵即逝”的良机。时机之所以是“稍纵即逝”是由于目前还可以“趁〔清朝〕皇帝还据有能够缔结条约的地位时，向他取得这种干涉的报酬”，具体地说就是“无限制地进入内地和沿海一切口岸，在北京建立

---

① 《阿礼国致文翰秘密报告》(1852年1月13日)，见米琪：《英国人在中国》(A. Michie: «The Englishman in China»)卷2，第429—430页。

直接外交关系，以及鸦片贸易的合法化”，这些在他看来都是可以从当前的武装干预中“获得的权益”<sup>①</sup>。接受了阿礼国的建议，文翰决定亲自到上海去，为的是“能够采取比领事权力所许可采取的更有决定性的行动”<sup>②</sup>。

正当文翰怀着极大野心赶来上海的时节，长江下游的战局起了决定性的变化。在太平军优势兵力的进攻下，南京在不到两周的时间内，便于三月十九日解放。文翰从英国领事馆那里获知各项情报：太平军纪律严明，战斗力旺盛，以及清王朝武装力量的腐败。特别是攻克南京这个严峻的事实，迫使文翰痛苦地承认：“一个坚强的武装团体〔指太平军〕占据扬子江上这样一座庞大而重要的城市，其位置适在帝国心脏部位，接近大运河，足以切断一切对首都的粮道交通，这么一件事是不可轻易放过不加重视的”<sup>③</sup>。现在文翰不得不对这支武装力量的“下一步动作”下工夫作仔细周密的观察，为的是“估计将来的重要课题”<sup>④</sup>。胜利发展的革命形势迫使英国侵略者收起趁火打劫的如意算盘，扬出虚假的“中立”旗号，观望军事、政治形势的进一步变化。

这一幕紧张而秘密的中外反动势力初次结合的阴谋虽然暂时地被迫中断，但是，事实本身清楚地表明，在生死搏斗的阶级斗争中，地主阶级的统治集团，从它的中枢到地方，但求本阶级的生存，不排除采用最卑鄙的手段的。这个事实反映了清王朝封建政权的性质在起着比第一次鸦片战争时更加浓厚的投降色彩的变化。

为了扩大勒索和扩张权益，国际资本帝国主义对中国的内战作了几年的观察。这期间，英国公使文翰、法国公使布尔布隆

① 《阿礼国致文翰机密报告》(1853年3月3日)，F.O.228/161，转见严中平：上引文。

② 《文翰致马斯伯雷》(1853年3月11日)，F.O.17/200。

③ 《文翰致罗素》(1853年3月28日)，《有关中国内战文书》，第1—2页。

④ 同②。

(de Bourboulon, A.)、美国公使麦莲(R. M. McLane)先后进入南京，亲自侦察革命力量的虚实，探询革命政权的对外态度。尽管太平天国的领袖们这时还没有足够地警惕到站在革命面前的敌人，除了封建清政府外，还有资本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但是，革命政权的固有性质和它所奉行的政治路线使得侵略者愈来愈了解到，它们不可能从太平天国那里捞到什么特权，甚至连他们从清政府那里已经攫取的权利还有丧失的可能。美国公使麦莲对这一点具有特别的敏感性。他在一八五四年通过对上海、福州、宁波各口的视察，以及对南京的窥探后，向华盛顿报告称：“天王兄弟及其臣下，当他们成为全中国的主人后，是否会承认中华帝国与英、美、法三国已订条约的义务呢？”据他的判断，“这是极不可能的”<sup>①</sup>。他“彻底相信太平军的胜利决非列强之福”<sup>②</sup>。资产阶级的历史学家也毫不含糊地表示：“西方列强为了保护自己的利益，越来越不能不去支持清王朝”，“他们日益感到维持当今朝代〔清王朝〕对西方国家有利”，因为清王朝“毕竟还是和列强有条约关系的”<sup>③</sup>。这种意见到了一八五六年已经成为列强的共同见解。于是，在追求扩张的共同基础上，英、美、法三国联合起来向清政府投送“助剿”的诱饵，以交换外国使节驻京和通商范围无限扩大等要求。所谓英、法、美“全面修约”，实即扩大侵略权益的活动便是在这样的军事、政治背景下出现的。正是“手段的卑鄙正好证明了目的的卑鄙。”<sup>④</sup>

在这里，还必须严峻地指出：中国从第一次鸦片战争后逐渐沦为半殖民地过程，沙皇俄国则变成了军事封建帝国主义。当英、

① 《美国参院档案》(1858—1859年)，第70—74页，转引自卿汝楫：《美国侵华史》，第1卷，第144页。

② 丹涅特：《美国人在东亚》，商务印书馆版，第204页。

③ 马士、宓亨利：《远东国际关系史》，(H. B. Morse, H. F. MaCNair: «Far Easter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第234、237页。

④ 恩格斯：《英国工人阶级状况》，《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466页。

法列强在我国南方入侵时节，沙俄则在我国东北边陲奉行军事侵略和外交讹诈相结合的反动政策，屡屡施展鼠窃狗偷伎俩，妄想达到鲸吞虎据的目的。

清王朝为了应付从海上入侵的西方殖民国家，曾从黑龙江、吉林边境抽调兵丁南下，东北陆防遂见削弱；尤其到了太平天国革命爆发，反动的清政府还是漠视于东北边防减弱的危险性，仍旧不断从黑、吉两省征调大批官兵入关，妄想扑灭革命力量，形成东北边境粮缺兵少，“各路无防”的严重局面<sup>①</sup>。它为沙俄侵略者提供了乘虚而入的机会。事情的发展正如马克思所说的：“这次战争〔指第一次鸦片战争〕又使中国发生起义，……使俄国能够顺利地由北方入侵”<sup>②</sup>。从一八五四到一八五七年沙俄侵占了黑龙江中上游北岸和黑龙江下游两岸的中国领土，蓄意制造“既成事实”，为逼迫签订不平等条约准备条件。现在，在蛮横的“修约”交涉基础上正酝酿着新的侵略战争，沙俄尽量利用这个机会，肆无忌惮地向黑龙江入侵，形成了与英法从南方沿海入侵遥相呼应的局面。对于这一事实，恩格斯在当时就严正地揭露：“正当英法两国的海陆军向香港调集的时候，西伯利亚边防的哥萨克部队却缓慢地、然而继续不断地把自己的驻屯地由达呼尔山移向黑龙江岸，而俄国海军陆战队则在满洲的良好的港湾周围设立堡垒。”<sup>③</sup>及至第二次鸦片战争爆发，沙俄立即派出使节普提雅廷(Putiatine, E. V.)赶来中国，与英、法、美串通，使用又打又拉的手法，逼迫清政府投降。

战争的进程暴露了地主阶级当权派卖国投降的本质。当英、法

① 自1853年初至1856年初，黑龙江省先后从瑷珲、呼伦贝尔、布特哈等处抽调入关的边防军，为数多达七千余名(见张伯英等撰：《黑龙江志稿》，第31卷，第33—44页)。吉林省原有守军一万〇一百〇五名，至1856年初四次征调入关的共七千名，已回者不及八百名；地处边防要冲的三姓、珲春、宁古塔三处仅剩老弱兵丁八百余名(见《始末》(咸丰朝)，卷12，第17、24页)。另参见余绳武：《沙俄侵华史》，第2卷，第115页。

② 马克思：《鸦片贸易史》，《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8页。

③ 恩格斯：《波斯和中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21页。

侵略军骚扰天津口外时，咸丰皇帝虽也声言“天津系畿辅重地”，命令他的军机大臣“亟应严为之备”<sup>①</sup>。然而，在这时真正使他忧心如焚的并不是侵略军迫近国门，而是雄据江南的太平天国以及安徽、湖北、河南、山东，尤其是京城附近捻军力量的日益强大。地主阶级的本性决定了他在全面地权衡内外矛盾时，首先注意到的是“现在中原未靖，又行海运，一经骚动，诸多掣肘，不得不思柔远之方，为羁縻之计”<sup>②</sup>。因此，咸丰特地嘱咐直隶总督桂良，指示他在与侵略势力交涉时，务必时刻记住“畿辅未靖”这一“大患”，切“不可稍涉张皇，致生事端”<sup>③</sup>。这种矛盾惶遽的神情如实地反映了清政府中枢的心理状态：尽可能地在侵略势力面前退让，争取妥协，而对待人民革命力量则决不让步半分。这种基本态度规定了第二次鸦片战争一经揭幕，投降势力便随之蠕蠕蠢动。

奉命与侵略势力周旋的桂良也十分了解咸丰的意旨。他在一八五八年与英法就天津条约讨价还价的谈判中，同样以国内阶级斗争形势严重为借口，向咸丰表示：“密迩京畿地方，土匪均思蠢动。一旦决裂，大局讵堪设想”<sup>④</sup>？实际上这是他为自己准备屈膝投降预先留下余地。

一八五九年，天津谈判中有关通商事宜移到上海举行。上海是买办势力集中的地方，负有全权谈判的桂良在与各种势力相接触后，向咸丰提出利用“中国商人和外夷商人”向侵略者“晓谕”劝导，以便在上海能够就地换约。这个主张居然博得咸丰的赞许。在咸丰看来，“夷人行止每多取决于商人，或可冀其挽回”<sup>⑤</sup>。在这里，桂良和咸丰都故意含糊其辞，实际上，他们所要利用的商人，指

① 《谕军机大臣等》（咸丰八年二月初八日），《清文宗实录》，卷245，第14页。

② 《始末》（咸丰朝），卷19，第23页。

③ 《桂良传》，《清史列传》，卷45，第35页。

④ 《桂良、花沙纳奏》（咸丰八年四月二十六日），《始末》（咸丰朝），卷24，第27页。

⑤ 《始末》（咸丰朝），卷36，第14页。

的就是那些与外国势力相交接的买办。封建统治集团企望仰仗买办力量来缓和中外争端，这不能不是封建政权性质变化过程出现的又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

不久，上海谈判陷入僵局，一八六〇年侵略战争又在天津周围猛烈展开，京城的安全受到了直接的威胁。咸丰在彷徨无策中又把接洽投降的使命交给买办来承担。他亲自密令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挽集上海“华商”去疏通“洋商”，寄信英、法侵略军头目额尔金等“先行撤兵，婉订和约”<sup>①</sup>。薛焕在接到密令后，立即召集买办化官僚、署苏松太道吴煦和买办出身的候补道杨坊“密商办法”。经薛焕“授以机宜”，杨坊前往怡和、宝顺洋行向洋商作种种解说，极言“兵端一日不息，则贸易一日不通”，于洋商极为不利，怂恿他们这时“惟有上紧要约各[洋]商会同寄信与额尔金、葛罗，令其先行撤兵”等等。据薛焕称，洋商对于杨坊的这一番说词，“颇以所论为然，唯诺而散”<sup>②</sup>。这一活动所包含的意义很发人深思。如果说，一年以前，咸丰皇帝是在桂良等的建议下，企图利用买办为封建政权效劳；那末，现在这个封建政权的总头目却幻想直接地动用买办势力作为解救战争危机的依傍了。这不正是表示买办势力对清政权中枢的影响有逐渐扩大的趋势和可能吗？

英法侵略军的北犯并不因买办势力的劝阻放慢速度；它一在天津得手，立即进扰北京。一八六〇年九月下旬，在留下恭亲王奕䜣充当商洽投降的全权代表后，奕䜣仓皇逃奔热河。留在北京的奕䜣及其亲信文祥在与外国侵略势力频繁接触中被驯服成我国近代史上第一批当权的政治买办。列强竭力利用中国国内阶级斗争的形势，诱使奕䜣一伙主动地向他们投靠。狡诈的英国公使卜鲁斯(F. W. A. Bruce)及其秘书威妥玛(T. F. Wade)深知奕䜣

① 《暂署两江总督江苏巡抚薛焕奏》，《筹办夷务始末补遗》，第531—533页。

② 同上书，第533页。